

委员 笔记

名家 名笔

国家荣誉感

冯骥才



▲冯骥才

赛，才可以唤起那种遥远而神圣的情感，那就是：为祖国而战！

尽管这只是“和平时期的世界大战”，或是一种美丽的战争模拟，或是最庄严的人类游戏。但是在和平时代，除去足球，很少有一种东西可以把人们的爱国情感如此强烈地激发出来。

你看，世界杯上的球迷——他们绝不只是为自己球队助威，更为了各自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呼喊！否则，一粒球的得失，怎么会等同于一种存亡？胜而举国光明，败则天昏地暗。

为此，球迷们从头到脚，全是国家的符号、标记与象征。球员好比上阵的武士，他们则是列阵势的浩浩荡荡的三军。此时，他们鲜明地感到——国家的尊严无比神圣，国家的荣誉无比崇高，国家的形象无比珍贵。

人世间唯有国家情感才能这样至高无上。国家情感，是一种历史情感，文化情感，地理情感，也是一种民族情感。它平时不知不觉地潜在人们心底，此刻却被有声有色、百倍千倍地激荡出来。

有趣的是，在比赛中，双方球员和球迷都争得你死我活；但比赛之后，球员们互相拥抱和互赠球衣，球迷们则在一起畅聚联欢。战争中的对抗相互伤害而更加仇恨；世界杯的对抗换来的却是友谊、交流，还有团结。

同时，不论胜者还是负者，各自的国家情感全受到一次强大的激发，人们心中那种神圣的精神需求都得到一次淋漓尽致的满足。

这是世界杯创造的奇迹，也是人类用足球创造的现代文明。

（作者系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

构建儿童文学的中国叙事体系

汤素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联系儿童文学创作实际，让我深感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伴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的中国儿童文学，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儿童文学叙事体系、价值取向和儿童观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儿童读者和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化工作者，几乎和西方读者同时共享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最新创作和出版成果。据有关方面数据统计，在前几年，有的出版社99%是引进版童书；在童书市场“畅销TOP1000榜”上的原创与引进作品的比例基本保持在3:7；在对儿童最早接触到的儿童文学——图画书的选择方面，家长和孩子的趣味严重受到引进的欧美日韩绘本影响。

儿童文学是为孩子的精神打底的文学，真正关系到培根铸魂的大问题，因此，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如何在广泛吸纳世界优秀儿童文学的成功经验和精神养分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民族化道路，构建儿童文学的中国叙事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我们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任务。

回顾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百年历程，1923年叶圣陶《稻草人》的出版，鲁迅先生盛赞其“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叶圣陶自己也曾说过，“我的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的第一篇是《小白船》，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写童话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习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念头。”叶圣陶明显是在受到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童话的影响开始童话创作的，《稻草人》中的《花园外》和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稻草人》和王尔德的《安乐王子》有着明显的互文性特征，他却开拓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己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儿童文学和他的成人文学一样，都是“为人生”的艺术，他的写作植根在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土壤中，童话的题材、人物形象和生活环境无不来自乡土风光、民间风俗、时令节气、道德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因此，《稻草人》虽然深受西方童话的影响，却完全是立足本土的中国故事。

陈伯吹先生创作于1931年的《阿丽思小姐》，单纯从书名来看我们就知道它和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有互文关系，作品的叙事结构受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影响，主人公的名字也是借用。他自己也说过，他开始学写童话，是在西洋文学的神话与传说、寓言与童话的影响下开始执笔的。但当我们阅读《阿丽思小姐》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陈伯吹塑造的是一个“中国的阿丽思”。作者想通过阿丽思这个形象，让孩子们“认识自己祖国的面貌，走自己该走的道路”。在这部作品创作到

一半的时候，恰逢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因此，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作者让阿丽思从梦境中醒来，关心国家大事，反抗强暴侵略。陈伯吹塑造的阿丽思形象富有鲜明的时代感，承载了作者对于中国孩子的希望。这部作品的成功，是因为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文学自觉：“《阿丽思小姐》创作的意图是塑造一个天真活泼、却又聪明能干的小姑娘形象——中国的阿丽思。”

上世纪50年代可以称得上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下次开船》、葛翠琳的《野葡萄》、萧平的《海边的孩子》、柯岩的《小兵的故事》等。这些作品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塑造了生气勃勃的时代新人形象，至今读来依然有感染力，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也成为了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比如张天翼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俄、英、日、法、德、印地、西班牙语等语种文字，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宝葫芦的秘密》多次拍成电影，还在2007年由美国迪斯尼公司和中国合拍成了真人动画片。

回顾这些作品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虽然吸纳了外国儿童文学的营养，但因为作家们所坚守的文学信仰和本土文化立场，作为文学研究会一员的叶圣陶先生所坚守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作家对时代命题的真诚回应，比如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陈伯吹先生希望阿丽思从梦中醒来，成为反抗法西斯的战士；作家们对以儿童文学培养时代新人使命的自觉担当，比如在《宝葫芦的秘密》中，张天翼希



▲汤素兰

望新中国的孩子们热爱劳动，摒弃不劳而获的思想；作家们自觉对中国民间故事素材的选取和转化，比如葛翠琳的《野葡萄》《九色鹿》；以及作家们自己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所有这一切，让他们在自己的儿童文学叙事中，坚守了中国气派，讲好了中国故事。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韦恩·布斯说：“每种艺术只有在追求它自身的独特前景时，它才能繁荣。”如果将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前景比喻为一棵大树，这棵树一定要既扎根于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又扎根于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既要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儿童文学的精华，也要从一切文学艺术中获取营养；既要立足于儿童本位，也要助益于儿童成长。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众多前辈作家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我们这些当代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了成功的范式，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守正创新，继续开来，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去构建儿童文学的中国叙事体系，书写独具中国特色的童年故事。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边走边写

愿家乡美丽富饶

——写在《西口情歌》之后

燕治国

我的家乡河曲县，静静地躺在山西省地图边子上。小县过去穷而偏僻，十年九旱，自古便是苦焦的地方。古代，那里曾经是抵御外族的边关，又是蒙汉交好的发源地。三四世纪以前，我的勇猛而顽强的父老乡亲，为了活下去，为了活得好一些，过黄河，穿沙漠，硬是在野狼出没的蒙古荒原，开创出来一块块如花似锦的生活乐园。这段历史，家乡人叫作“走西口”。个中的艰难险阻，写出来是一部大书。个中的悲欢离合，说起来让人肝肠寸断。

我们家几代人走西口，亲戚撒遍内蒙古。很小的时候，我曾经随着家人跪在黄河畔，迎接过我爷爷的灵柩。爷爷病倒在河套川，棺木是用牛车拉回来的。我父亲走口外，一直走到河曲“土改”了，新中国成立了，才算结束了“到野鬼”的流浪生涯。

到了我这一代，自然再不要走西口了。先是读书上学，以后参加工作捧上了公家的饭碗，先人们几百年迁徙流浪的陈年旧事，慢慢地从眼前飘走了。而那些自小在耳熟能详的凄凉的山曲儿，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离我远去了。

大约是1982年的春天，我坐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教室里，正在听丁玲、艾青等前辈讲述他们的故事，耳畔突然便响起家乡的山曲儿。那歌声那么亲切，那么强烈，我甚至听出来那就是我母亲唱的。我甚至看见我父亲赶着牛车，正艰难地行走在库布齐沙漠里。我听到一段雄浑的历史在召唤我，我听到万首民歌反复吟唱着一句歌词：哥哥你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

我悄悄离开教室，我无法遏制自己的眼泪。我知道自己想家了。想家乡父母，想妻子儿女，也更令我怦然心动的，是突然感觉到自己必须干一件事情，那便是把家乡的民歌整理出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少首，到底记载了些什么。

于是我开始搜集大量家乡民歌，把我从小听到的，把我能看到的，一一摘抄记录下来。开始的时候，我就像当年走西口的穷汉走进广袤的蒙古高原，满眼都是肥沃的泥土，满眼都是丰硕的果实。伸手便能抓，抓住了便往口袋里装。结果民歌抓了不少，但显得太杂太乱，也太耗费精力。以后忙于编刊物，忙于家务事，这件事时断时续，始终没有做完。

1995年，我从《山西文学》编辑部转到山西文学院，总算有时间去了却一桩心愿，那便是踩着先人的



▲燕治国

脚印，一直走到西口外，去体验他们当年的艰难，去领略他们创造的辉煌。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巴彦淖尔，在八百里河套，我时时能感受到先辈们留下来的气息，能感受到蒙汉人民割不断的感情。走西口是一部悲壮的流浪创业史，也是一部蒙汉民族经济文化的交融史。走西口养活了千千万万内地穷汉，走西口留下来千万首悲凉的歌。这段历史似乎没有引起文化人特别的关注与研讨。走西口的故事能流传下来，几乎全靠民间传唱的小戏和山曲儿。

从内蒙古回来，我一边着手长篇小说的准备工作，一边把大量民歌输入电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组合筛选。删去那些常见的杂歌以后，我突然发现河曲民歌竟然就是一部相当完整的叙事长诗，而且具有史诗般的震撼力！走遍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歌或情歌，但像河曲县这样，竟然有几千首民歌围绕一段历史、围绕一个主题，吟唱日月的艰难，吟唱感情的煎熬，用山曲儿来讲述一对对青年男女从嬉戏、相识到成亲、离别、思念、情伤、盼归、受苦直至西口归来的全过程，且能一代代流传下来，实在是一种十分奇特、十分令人震撼的文化现象。倾听或捧读这些凄婉动人的山乡小曲，让人感慨唏嘘，心灵为之震颤。

我用几年时间编完这本书。我将书名定为《西口情歌》。只有一个情字，才能把家乡父老几百年走西口的历史装进去。只有一个情字，才能表达出我对家乡的挚爱。

（作者系著名作家）

艺文 从谈



▲王凯

我的中篇小说《荒野步枪手》（《人民文学》2021年第8期）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是意外的惊喜，同样也是巨大的鼓励。回头看看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倒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2019年冬天，我被派往朱日和训练基地参加演习拉动，在草原上度过了难忘的几个昼夜。那几天我住在演习场的卡车上，最低气温超过零下20摄氏度，除了凌乱的风和思绪，包括肢体、感官和矿泉水在内的一切都被冻结了。尤其是在没有火、没有光也没有手机信号的寒夜，我缩在睡袋里，最大的愿望是能喝上一口热水。回想起来，那应该算得上是我从军30年来最难熬的日子之一，这让我觉得那几天的罪不能白受，无论如何也得写篇小说出来，所以就有了这篇《荒野步枪手》。

说起来，这很像是一次“报复性”写作，最初我只是想写写那几天的困顿和难熬，动笔后才发现这没多大意思。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时刻，别人的难熬可能比自己的难熬更难熬，而那些印象

生活陨石的撞击坑

王凯

深刻却又零落散乱的生活碎屑究竟有何意义，这可能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自己之所以在那一段旁逸斜出的荒野生活面前如此狼狈，恰好说明了我的身体素质、精神活力和军人素养日渐退化，并且对曾经无比熟悉的军营生活开始感到陌生。与此相似的是我的写作。我就于安定与舒适，回避探索与变化，却很少意识到时间正在不断刷新我曾认定的生活，而它们正变得跟从前大不一样了。记得在朱日和演习场，年轻的战士们按照训练要求，连棉帽、大衣和防寒鞋都不穿，冻得不停搓手跺脚，手和耳朵皴裂红肿，却依然精神抖擞地忙碌着。我常常搞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他们使用的武器装备，谈论的专业问题，隶属的作战单位，全新的训练标准都让我感到新鲜而陌生，以致成了一个茫然无措的局外人。但我不甘心。再怎么说我也是个有着整整30年军龄的老兵，从基层连队到空军机关都工作过，不论出于一个老兵的自尊心还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我都很想并且必须进入他们的语境和生活。在我看来，正如他们每个人都身背着步枪一样，每个人都怀揣着各自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往往正是宏大乐章的音符之一。而我应该努力也应该能够去倾听、拥抱、理解并书写这些故事，不仅写下他们经历了什么，最好还能记下他们曾想过些什么，认真去收纳整理那些火苗般跳动着、细小而又滚烫的内心感触，或许才是文学永远能够抚慰和打动心灵的原因之一。

有了这个想法，似乎就可以动笔了。不过真正开始写这篇小说依然等到了一年之后。因为我需要作一个基本的判断，来看看这几天的经历到底是不是

真的值得去写成一篇小说。在我的感觉中，每一篇小说是否开始，标准就是关于这个小说的念头是否能在脑海里长久地盘旋不去。如果这个念头出现不久就消散了，那也就没必要去写它了。不过还好，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总会不时想起冬季荒野上那几天的生活，当时的冷，当时的风，当时的思绪和感触，那些细节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时间久了就成了几件心事，你不把它写出来它就会一直在那儿晃着，让你感到心神不宁。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小说一直写得不多，而且事实证明，我以前用那些容易消散的念头写出来的小说往往都不怎么让自己满意。当然，“是否开始”只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开始”。说实话，写作的过程并不顺利，主要是里面缺少一个真正的主人公，所以来来回回开了好几次头都进行不下去。直到有一天，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战士的形象，那个战士有点像是我在朱日和基地见到的那几位士官，但又不是，这个战士身上似乎还有我在连队带过的兵，或者在漫长军旅生活中接触过的那些士兵的影子。他们身怀绝技又朴实善良，身处集体却又个性鲜明，换句话说，小说中的中士“庆欢喜”就是用我心里无数个士兵的侧影共同勾勒出的一个新的士兵形象。有了这样一个士兵的模样，我知道这个小说真的可以写下去了。

现在看来，《荒野步枪手》讲述的既是一个关于军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相遇的故事。故事其实挺简单的：一个已经离开基层连队多年的老兵和一个带着传奇色彩的年轻士兵，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偶遇在了演习场。他们各自怀揣

着不同的经历和往事，一个属于过去，一个属于现在，起初他们不那么友好，但是在辽阔的荒野上，他们还是找到了关于军旅、关于人生的情感共鸣。小说里关于老兵的描述大多来自于我30年的军旅记忆，而关于年轻中士的部分则大多源自我在冬季演习场那几个昼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就连小说里面那个长长的物品清单也是完全真实的，因为那就是我出发之前在自己手机备忘录上列出的物品清单。而那些年轻的、新鲜的甚至有些陌生的细节、故事和面孔，刷新了我固有的经验和认知，我觉得这也是小说中最为蓬勃和最有质感的一部分。从这一点上说，《荒野步枪手》也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文学处在时间之中，同时也容纳着时间。可以说，这个小说可以视作我被生活的陨石撞击后形成的印记，带有强烈的突然性，所以写作时也带着一种跟以往不同的感觉，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写作中还有一个特别的感受——这是我多年写作中最贴近当下基层官兵战斗生活的一个作品，它来自我不那么熟悉的生活，而非来自我固有的经验和记忆。这一点会给我带来新的挑战，让我试着从看似无意义的琐碎生活中去寻找故事，塑造人物甚至提炼意义，学会如何接纳并处理自己经验之外的生活。这应该是写作《荒野步枪手》的收获之一。

《荒野步枪手》的获奖，首先要感谢鲁迅文学奖评委会对我的认可和鼓励，这是一次慷慨又充分的战斗补给，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勇气和信心。同样需要感谢的仍是气血充盈的军旅生活对我的塑造和滋养，让我有幸在真实与虚构之中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阵地，而我愿意继续在此不懈坚守。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